

2023 年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 2022 年国内外期刊中有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文献,分别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与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百年变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推进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等视角,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前沿进行梳理和回顾。这些文献对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 马克思主义 共建“一带一路” 全球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 话语体系构建

一、引言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乌克兰危机引发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突出,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令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对于这些困难与挑战,如何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对国际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基于此,本文对 2022 年刊发在国内外期刊上有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管理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国际政治科学》、《国际政治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 *Monthly Review* 等期刊选取 56 篇文章,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与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百年变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推进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等视角,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和回顾,以期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的相关理论来分析和解决当代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现实问题。

从 2022 年国内外主要期刊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文献分布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研究》以 14 篇的数量稳居第一,约占刊发总数的 25%;其次为《世界经济与政治》,刊发了 9 篇,约占总数的 16%;《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均刊发了 4 篇,约占总数的 7%。此外,《当代亚太》、《国际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科学》、《管理世界》、《外交评论》等也刊发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献。

从 2022 年国内外主要期刊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议题分布情况来看,有关推进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文献最多,为 15 篇,占比 27%;其次是有关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文献,有 13 篇,占比 23%;再次是有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文献,为 10 篇,占比 18%;第四是有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与发展、百年变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献,各有 9 篇,分别占比 16%。这些文献研究议题重大,研究范围广泛,研究视角新颖,对推进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内涵与发展

习近平外交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其理论内涵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的主动性、塑造性日益增强,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经验基础。

(一)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

当前，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四梁八柱”已经形成，并将长期指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内容主要包括对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判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丰富完善、提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郭树勇和舒伟超（2022）^①认为，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内涵丰富和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中，除了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外，还包括国际形势复杂动荡的变化对习近平关于时代内涵新判断的影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发展对外交思想的塑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促进、大国外交理论话语权较量对外交理论的梳理和完善的推动。

新型国际关系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吴志成和刘培东（2022）^②认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须秉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正确义利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等理念原则，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新型国际关系观的提出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和平发展环境、开辟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路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王帆（2022）^③则认为，中国外交战略应在坚定维护“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目标前提下，注重若干战略方向：提升国际影响力，完善和变革国际秩序；提升综合国力，增强战略自主性；维护周边总体安全与发展。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坚定明确的战略方向，做好战略规划，科学精细地安排战略资源，把握战略重点和矛盾，协调和把握各战略目标之间的动态平衡。

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正确义利观。坚持正确义利观是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理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凝练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基本立场和主张，对推动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徐成（2022）^④结合理性主义和文化心理学两种范式提出了分析中国对外关系与行为的义利逻辑。其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关系与行为通常是在追求带有情感色彩的长期关系互惠（义）与短期明确利益或理性国家利益（利）之间相平衡的结果。这种平衡的关键在于义利冲突的程度，如是否损害主权、安全等核心国家利益以及持续损害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其他重要利益。义利平衡使得中国与其他大国双边关系的变化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呈现出比一般的国家间关系更强的好坏效应。但同时，如何衡量通过情感互动实现长期关系互惠、该偏好究竟是为中国所独有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国家为追求长远整体利益而放弃短期利益是否可以理解为理性的一种特殊呈现方式等问题，该研究并未给出较为明确的答案，这为未来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努力的方向。

（二）中国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① 郭树勇、舒伟超（2022）：“论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内涵的丰富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第4-28页。

^② 吴志成、刘培东（2022）：“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新型国际关系观”，载《东北亚论坛》，第2期，第4-16页。

^③ 王帆（2022）：“中国外交的战略排序与多目标决策”，载《外交评论》，第2期，第1-20页。

^④ 徐成（2022）：“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义利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第2期，第104-128页。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解释外交实践又指导外交实践的理论。赵可金和赵丹阳（2022）^①认为，在指导思想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构成性理论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在解释实践方面，共同体理论作为解释性理论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学理基础。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华文明天下观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另有学者对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经济外交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两重性的论述是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理论依据。习近平关于世界百年大变局、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开放发展新理念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在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中的最新成果。裴长洪（2022）^②认为，应深刻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判断，深刻认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规律。“双循环相互促进”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的科学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总结归纳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实践中提出的基本政治经济学问题可得，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条件下，如何处理国内生产力与世界生产力的互动关系，如何处理生产力发展与国内外生产关系、国内外上层建筑的关系与矛盾。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而言，国际关系本身的发展变化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是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以美欧理论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当前国际关系解释和预测不足、内部缺少发展动力、思想性理论和大理论匮乏、研究视域单一等问题日益突出。同时，非西方学界的理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我国学界也一直在努力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孙吉胜（2022）^③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要求我们从本体层面、经验层面、规范层面入手把中国外交实践上升为理论认识和知识体系，使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或是建立另一种新的理论叙事。这不仅可以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外交理念、政策和实践，也可以使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内容和视角更加丰富，真正反映多元、多维、多样的世界。

在国际关系现实复杂性提升和国际关系理论式微的背景下，理论创新需求强烈，创新方式较为多样。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在无政府性和制度性的国际体系下，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是主权国家行为的最根本动力，国际制度性权力成为一种基础性权力形式，国际制度具有多重权力属性，国际关系呈现出冲突—合作复合形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演进的方向和方式。张发林（2022）^④认为，现实制度主义作为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补充，从理论综合的角度出发对解释国际关系形态的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进行合成，尝试对国际关系冲突—合作复合形态和国际秩序变迁提供一种理论解释。它较好地解释了中美关系的复合形态，以及中美制度竞争对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影响。高鹏（2022）^⑤则探

^① 赵可金、赵丹阳（2022）：“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期，第5-26页。

^② 裴长洪（2022）：“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载《经济研究》，第1期，第37-54页。

^③ 孙吉胜（2022）：“中国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载《国际政治科学》，第4期，第27-53页。

^④ 张发林（2022）：“现实制度主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成”，载《国际政治研究》，第4期，第73-94页。

^⑤ 高鹏（2022）：“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认识论的发展与创新”，载《国际政治研究》，第1期，第62-86页。

讨了全球国际关系学对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和启示,其认为,全球国际关系学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议程,丰富和发展了国际关系研究认识论中的认识视角和认识路径。在认识视角上,全球国际关系学批判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主体性,超越西方一非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并呼唤多元普遍主义的国际关系知识。在认识路径方面,全球国际关系学通过扬弃科学路径,改进以历史阐释见长的经典路径,强调历史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它可以启迪中国学者更深层次地理解包含中国自身在内非西方的国际关系实践,使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更具全球关怀。

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它作为全球合作平台和公共产品,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相关文献分别从政策红利溢出效应、劳动配置效率、资金融通效率、政策协同、国家形象、国家治理等方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并得出稳健可信的结论,这对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一) 共建“一带一路”的经验与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瞻远瞩地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合作倡议,取得了斐然成绩,主要体现在:政策沟通意愿不断增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组织日渐增多;设施联通稳步推进,中欧班列畅通运行;贸易投资不断增长,经贸合作日益深入;资金融通规模不断扩大,国际金融合作愈加密切;民心相通显著增强,友好合作不断深化。吕越等(2022)^①认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成功经验表明,应始终坚持党中央的全面领导,探索统筹推进;部委政策配套、地方规划跟进、国际组织对接,积极配合“四位一体”模式;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共商共建共享”的积极作用,引领国际合作新范式;强化“第三方市场合作”,鼓励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融入中国产业链分工体系;推动中欧班列由贸易合作向产业合作转变,形成畅通亚欧区域价值链的大通道;坚持以市场化原则为导向,协同“五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发展框架与支撑平台。宋科等(2022)^②则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后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提升沿线国家人民币跨境交易金额和笔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邻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高资本账户开放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分货币职能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承担交易媒介和计价单位职能的作用,而对价值贮藏职能没有显著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沟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渠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合作平台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王灵桂和杨美姣(2022)^③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① 吕越、马明会、李杨(2022):“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与经验”,载《管理世界》,第10期,第44-55页。

^② 宋科、侯津柠、夏乐、朱斯迪(2022):“‘一带一路’倡议与人民币国际化——来自人民币真实交易数据的经验证据”,载《管理世界》,第9期,第49-62页。

^③ 王灵桂、杨美姣(2022):“发展经济学视阈下的‘一带一路’与可持续发展”,载《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第5-18页。

视角,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与实践、203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炼出贫困与不平等、经济发展、健康与可持续的社会、气候与环境、投资与援助等五大关键变量,建构了发展经济学视阈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分析框架,阐明全球发展倡议的生命力。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完美契合 203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彰显了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面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大国竞争态势和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挑战,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继续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赋能。

此外,还有学者从中非命运共同体视角研究了“一带一路”的成就。丝绸之路还具有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内在意蕴。郑和七下西洋四处非洲是古代中非交流史的巅峰。新形势下,中非携手破除“西方中心论”,弘扬“仁和为先、宽容开阔、以义统利、太平共享”的郑和精神,不但可为当代非洲“向东看”和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夯实历史根基,而且将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树立典范。当前,中非正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平台,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李新烽,2022)^①。对于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未来应精绘共建蓝图,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凝聚共建共识,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共同参与;夯实共建平台,提升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支撑作用;打造共建标杆,高标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筑牢风险屏障,全面提高境外安全保障和应对风险能力(吕越等,2022)。

(二) “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机理

一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红利溢出效应显著。武宵旭和葛鹏飞(2022)^②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究投资促进效应(BR-IPE)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后发现,整体上,投资促进效应对中国企业在非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增量引致”效应。动态效应上,在“一带一路”沿线倡议实施之后的前三个年度,投资促进效应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存量转换”效应,即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挤出了企业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之后,投资促进效应的正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即对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显著的“增量引致”效应。投资促进效应对企业向非沿线国家OFDI的“增量引致”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非沿线发达国家,而对国有企业、非沿线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表现为“存量转换”效应。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海外市场需求的扩张是投资促进效应影响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的重要机制。

二是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提升劳动配置效率。罗长远和曾帅(2022)^③采用2010-2018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一带一路”建设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后发现,在平均意义上,“一带一路”建设显著改善了重点对接省份企业的劳动配置效率,对资本配置效率没有显著影响。“一带一路”建设主要可能通过深化重点对接省份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促进它们的双向直接投资改善了劳动配置效率。要素流动表现出“劳动往高处走,资本往低处流”的特征,导致劳动和资本的配置效率出现“分野”:在重点对接“一带一路”的省份,

^① 李新烽(2022):“郑和远航非洲与中非文明互鉴”,载《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第162-182页。

^② 武宵旭、葛鹏飞(2022):“‘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还是存量转换”,载《财贸经济》,第9期,第133-146页。

^③ 罗长远、曾帅(2022):“‘一带一路’建设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研究”,载《金融研究》,第7期,第154-169页。

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配置了更多的劳动要素，劳动配置效率得以改善；但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资本生产率高的企业还没有体现出获取资本要素的优势，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效果尚不明显。

三是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提高资金融通效率。徐思等（2022）^①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微观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后发现，相对于非支持企业，“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能够显著降低支持企业的公司债二级市场信用利差，且支持企业在倡议提出后有显著更高的债券累计超额回报率。“一带一路”倡议对公司债二级市场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主要通过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来实现，政策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重点对接行业以及重点对接省份的企业。在倡议实施之后，受倡议支持企业在一级市场发行的公司债利差下降幅度更大，且包含的担保条款以及限制性契约条款显著更少。

四是“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动参与各方的政策协同来促进经济增长。“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深化对外开放和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新战略，也是在新常态下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战略部署。彭红枫和余静文（2022）^②通过重新构建资本项目开放指标，采取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和双重差分法，从政策协同的视角分析资本项目开放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政策协同对于资本项目开放发挥经济效应十分重要。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取的资本流入管制放松与中国的资本流出管制放松措施相匹配时，推进资本流入管制放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一带一路”倡议还显著降低了沿线国家的资本流入管制程度，中国的资本流出管制放松在区域内具有政策传递效应。

五是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王金波（2022）^③基于2005-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民意调查”数据，采用多期倍分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国家形象显著正相关。“一带一路”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赫希曼效应与贸易、投资、双边政治关系、伙伴关系的中介效应均会显著提升一国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和对中国的认同。“一带一路”与制度、文化、政体差异、外交立场等距离变量的交互效应以及对中美权力变化、中美战略关系的优化、调节效应会有效缓解、改善一国对中国的错误认知、消极感知和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困境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一带一路”的合作性叙事及其对竞争性甚至敌意叙事的隐喻替代也会显著弱化一国对中国的负面推理、叙事框定以及与中国的身分和情感对立。中国应继续发挥和巩固“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叙事体系的正向作用，同时重新框定中美关系和解构中美战略叙事。

六是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提升相关参与方的国家治理水平。杨竺松等（2022）^④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东道国国家治理的“有条件影响”分析框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对于参与国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具有积极影响，但这

^① 徐思、潘昕彤、林晚发（2022）：“‘一带一路’倡议与公司债信用利差”，载《金融研究》，第2期，第135-149页。

^② 彭红枫、余静文（2022）：“政策协同与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载《世界经济》，第12期，第29-51页。

^③ 王金波（2022）：“‘一带一路’能否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载《世界经济与政治》，第2期，第4-31页。

^④ 杨竺松、陈冲、杨靖溪（2022）：“‘一带一路’倡议与东道国的国家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期，第4-29页。

种影响取决于参与国在政治上对华友好的程度。友好的政治关系通常可以显著增加深度合作与信任,防止第三国对参与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干扰,从而更有利于这些国家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促进其实现国家有效治理和发展。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项目落地、推动东道国的国家治理水平提升不仅需要进一步维护与强化参与国的对华友好政治关系,也需要防范第三国的战略干扰。

四、百年变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从根本上回答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向纵深发展、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世界应该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指引着中国和世界前进的正确方向,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一) 百年变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要深入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需深刻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与内涵。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之问。2019年3月他在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致辞时曾明确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其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对“世界怎么了”之问的凝练解释,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对“我们怎么办的”的中国方案。

冯维江和张宇燕(2022)^①认为,首先,大变局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进程,其中充满进步力量与倒退势力的斗争,这一进程可能存在各种反复,对其中进步或机遇的一面要怀有信心,对其中风险挑战的一面,应做好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其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深入发展之际,适逢中国推进民族复兴的关键期,所以中国之前途命运对大变局的走向及影响尤其敏感。必须对国内各地区、各阶层、各届别、各领域予以充分的思想和资源的动员,来应对大变局所伴随的风险挑战。最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因为单极化、反全球化等退步或反动势力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挑战、乱象会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这些国家应当加强合作,形成国际上的统一战线,来共同应对大变局中的风险挑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层面主要表现为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形势处于新的转折点,各种战略力量分化组合、国际体系加速演变深刻调整,大国关系深入调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在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一大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在安全层面主要表现为国际环境总体稳定、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战乱恐袭、饥荒疫情此伏彼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在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在科技层面主要表现为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新工业革命风起云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也是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同时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是对中国共产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世界观的继承和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其核心内涵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

^① 冯维江、张宇燕(2022):“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载《经济研究》,第6期,第4-12页。

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也即，在政治和伙伴关系方面，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在安全格局方面，要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在经济发展方面，要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在文化和文明交流方面，要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在生态建设方面，要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李坤望和张兵，2022）^①。

张新（2022）^②认为，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具有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性、鲜明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丰富性和系统性、鲜明的中国特色等显著特征，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体的系统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李坤望和张兵（2022）认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了世界各国增进人民福祉、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回应了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普遍诉求，是中国所贯彻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在国际领域的集中体现，为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实现共同繁荣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已经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一面鲜明旗帜。中国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践。在多边场合或平台上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的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国际秩序观、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提出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坚定支持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国际局势深刻变化，国际社会的发展与安全面临严重失衡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三变”的新论断和“四大赤字加重”的新判断，深刻分析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新挑战。吴志成等（2022）^③认为，解决“四大赤字”，和平是前提，发展是关键，安全是保障，治理是路径。中国应致力于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热点问题解决，夯实国际安全价值基础。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推动文明交流与互鉴，实现文明共存。推动“发展型和平”，以务实举措破解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难题。树立和增强自主创新意识，积极应对科技封锁的威胁。熊李力（2022）^④认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展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担当，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行动方案与实践路径细化为人类发展共同体和人类安全共同体两个方向，为弥补全球发展赤字和安全赤字提供了代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中国方案。进一步落实两大倡议，有效填平全球发展鸿沟、破解国际安全困境，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追求目标，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使命，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已经成为中国协调与

^① 李坤望、张兵（2022）：“人类命运共同体”，载《经济研究》，第6期，第19-25页。

^② 张新（2022）：“论习近平关于共同体重要论述的特征和原创性贡献”，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第46-55页。

^③ 吴志成、戴长征、方长平、袁正清、郭锐、黄鹏飞、信强、梁斌（2022）：“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国家安全、全球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俄罗斯研究》，第6期，第3-41页。

^④ 熊李力（2022）：“中国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方案与实践路径”，载《人民论坛》，第22期，第52-55页。

世界关系的重要抓手。它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性问题的中国答卷，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志钦（2022）^①认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持续演进，中国通过以对话协商持续推动大国的协调与良性互动为重点，构建持久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共建、共享制定全球安全规则为重点，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抓手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合作、共赢为手段，以全球发展倡议为抓手构建普遍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交流、互鉴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以“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为抓手构建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吴宏政（2022）^②则从人类文明新形态视角分析了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普遍文明形态为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自由解放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代表着人类进步方向的普遍文明形态，它超越了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引领了构建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潮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明形态基础。

还有学者研究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技术外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极其重视科学，不仅因为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方面的经济作用，而且还因它在理解世界方面的启示力（Sheehan, 2022^③）。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风口，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和战略意义给世界政治和各国外交带来了深远影响，催生了技术外交。它注重全球高新技术企业等新兴技术主体的专业和引领作用，具有目标的政治性、任务的全球性和议题的广泛性等特点，致力于根据技术实力、能力和潜力对关乎利益、安全和关系等问题的走向产生影响，并在创新外交理念、改革组织机构、制定外交战略和搭建对话平台等方面开展了阶段性实践，回应了新工业革命对外交变革的要求。但近年来，各国战略竞争在高新技术主战场升级，技术外交也面临美国“技术联盟”的压制和封锁、对话中的话语与立场压力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全球技术治理缺乏合法性等困境。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变化动态地以网络适应度来形塑国际权力，大国为争夺全球价值链枢纽与链接而博弈和竞争（余南平，2022^④）。任天威和刘建飞（2022）^⑤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全球命运相依，注重各国及各类国际行为主体为人类的共同发展做出贡献，重新强调了国际合作的人本逻辑，引领中国走出了既满足本国需要又可供各国参考的技术外交路径。从长远来看，这也是突破技术外交困局的根本出路，进一步具象了技术外交的发展前景，对推动人类开展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及实现共同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① 史志钦（202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背景、中国贡献与深化路径”，载《人民论坛》，第24期，第118-122页。

^② 吴宏政（2022）：“‘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贡献”，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第64-72页。

^③ Sheehan, H. (2022). Marxism, Science, and Science Studies: From Marx and Engels to COVID-19 and COP26. *Monthly Review*, 74(1), 35-48.

^④ 余南平（2022）：“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及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第120-137页。

^⑤ 任天威、刘建飞（2022）：“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技术外交——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技术外交发展的重要意义”，第7期，第58-79页。

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全球经济治理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主要体现为发起倡议设立多边金融机构、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人类文明新形态及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等，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陈景彪（2022）^①认为，习近平关于经济全球化重要论述坚持在历史大势中科学地认识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其发展趋势，以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为其发展方向，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为其战略对策，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其重要路径，具有人民主体性、开放性、包容性、普惠性、平衡性、共赢性等理论特质。习近平关于经济全球化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超越，是当前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和推进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行动指南。

一是发起倡议设立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作为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为国际开发援助提供了一个以市场开发为主的崭新的经贸治理工具。汪建新（2022）^②用 2010 到 2020 年的全球贸易数据以 91 个国家加入亚投行作为准自然试验，研究发现：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以及加入亚投行之前的各国，加入亚投行的成员方整体上多出口 3% 以上的金额。在控制了一带一路、亚洲开发银行、中欧班列、政治外交关系、境外经贸合作区、经贸协定和新冠疫情等干扰因素以及安慰剂检验之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亚投行推动了各成员方的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数量和质量在推动各成员方对外出口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中间渠道作用。也即，亚投行的成立从经济上推动了各成员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关联与由此的贸易增长。

二是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举措。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困境，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贫富分化、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等问题。全球发展治理面临空前挑战，大国博弈等地缘因素加剧发展治理的多边合作困境，一些发展治理机制失灵，各国合作意愿减弱，发展治理手段单一，治理缺乏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全球发展治理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更加凸显。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高度重视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发展视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孙吉胜（2022）^③认为，在国际层面，中国不断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在理念和制度方面积极创新，在行动方面积极努力，深度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初步建立了发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未来，中国需要在全世界发展治理方面继续夯实实践话语权、理念话语权、制度话语权和理论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与各国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① 陈景彪（2022）：“习近平关于经济全球化重要论述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8 期，第 87-96 页。

^② 汪建新（2022）：“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与全球贸易增长：以加入亚投行为例”，载《世界经济》，第 12 期，第 3-28 页。

^③ 孙吉胜（2022）：“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提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第 12 期，第 4-31 页。

全球发展倡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全球发展倡议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以实干为途径，充分聚焦具体重点领域，为解决当今世界难题和匡正全球发展新征程，提供了一份立足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实际，饱含中国智慧，浓缩新时代治国理政精华的中国方案（李志强，2022^①）。全球发展倡议需要有序推动制度化建设，国际制度和组织是全球层面合作的主体平台，从国际制度层面审视和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利益、规范、话语和过程是全球发展倡议制度建设的基本考虑因素。其中，利益共享是制度建设的基础，规范共融是制度建设的优势，话语共通是制度建设的保障，而过程共创是制度建设的特色（王明国，2022^②）。

三是全球安全倡议是对中国所秉持的新安全观和全球治理理念的丰富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王功和刘军（2022）^③认为，全球安全倡议是破解人类安全难题、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其所包含的“六个坚持”核心要义体系完整、内涵丰富，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国际安全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对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扬弃超越。全球安全倡议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和主流民意，是继全球发展倡议之后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对当前深陷安全困境的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合力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吴晓丹和张伟鹏（2022）^④认为，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和实践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安全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更彰显了积极履行国际责任、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国担当，为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前进方向。全球安全倡议植根于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国际安全观，是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地缘政治安全理论的超越。这一重要倡议具有深刻思想性、战略性、时代性、开放性，为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行动指南（刘卿，2022^⑤）。

四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及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对完善全球治理的促进作用。孙熙国和陈绍辉（2022）^⑥认为，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华，也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解决中国问题的伟大创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精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真理和道义的高点，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构筑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基础，实现了文明理论的范式革命和文明形态的伟大创造，推动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伟大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解决人类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

^① 李志强（2022）：“论全球发展倡议的重大意义”，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7期，第17-21页。

^② 王明国（2022）：“全球发展倡议的国际制度基础”，载《太平洋学报》，第9期，第35-47页。

^③ 王功、刘军（2022）：“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要义、理论创新与世界意义”，载《国际问题研究》，第3期，第16-28页。

^④ 吴晓丹、张伟鹏（2022）：“全球安全倡议：内涵、意义与实践”，载《国际问题研究》，第4期，第39-57页。

^⑤ 刘卿（2022）：“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载《东北亚论坛》，第5期，第3-13页。

^⑥ 孙熙国、陈绍辉（2022）：“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世界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第26-42页。

吴志成和李佳轩（2022）^①认为，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多元多样是基础、平等尊重是前提、开放包容是动力、和合发展是目标，强调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的统一、以我为主与兼收并蓄的统一、和而不同与聚同化异的统一，在实践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文化多元主义，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机制建设。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文化指引，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消除了思想文化障碍，为促进国家间互信合作夯实了文化基础，也为促进和改善全球治理、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田旭明（2022）^②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铸就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人民为中心、自主发展、和谐共生、胸怀天下的文明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新版本，是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的新型文明样态，丰富了人类文明坐标图和话语史。这一文明新形态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新秩序塑造作出巨大贡献，同时还内生和建构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且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话语体系，逐渐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和“西方中心论”，推动人类走向话语共生共存与平等共处的时代。例如，在全球治理层面，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西方单边主义、零和博弈的霸权话语等。

六、推进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成功开展国际议程设置既是拓展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也是大国展现国际形象的有效途径。百年大变局下的意识形态风险面临新境遇、呈现新特点，必须重视追踪大变局所隐含的意识形态风险源头，从根本上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

（一）国际议题设置与传播

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具备基本对外交流能力、专业能力、话语塑造能力和舆论把控能力，也涉及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和共情能力。孙吉胜（2022）^③认为，在世界上塑造公正、客观、全面的中国观，亟需进一步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在多层话语内容、多样话语风格、多元话语主体、多维话语平台以及多学科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不懈努力，为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形象塑造良好的国际话语和舆论环境，增进各国相互信任，加强国际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杨娜和程弘毅（2022）^④研究发现，“传者框架与受众框架之间的互动是影响议题传播效果和议程设置成败的关键”。当两种框架不一致甚至存在冲突时，议程设置或是成败不明、或会走向失败。为此，中国在开展国际议程设置活动时，需要综合考察议题接收方的多元利益，使议题在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同时，尽可能避免与接收方的核心利益产生冲突，以实现各国共同利益和一国优先利益的平衡。此外，一国需要以负责任大国形象和践行正确的义利观等方式来提升并维护行为体认同，如此方能实现框架匹配，保证议题传播的效果。

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

^① 吴志成、李佳轩（2022）：“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析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第6期，第4-25页。

^② 田旭明（2022）：“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意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第56-66页。

^③ 孙吉胜（2022）：“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挑战与方向”，载《外交评论》，第3期，第1-20页。

^④ 杨娜、程弘毅（2022）：“理解国际议程设置：议题传播与框架互动”，载《当代亚太》，第5期，第135-165页。

展的内在需求,是构建人类政党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体现。臧秀玲(2022)^①认为,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原則要求包括: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升话语供给力;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话语竞争力;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升话语吸引力;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提升话语影响力。实践路径则包括,创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体系,充分发挥多元话语主体的对外宣传功能,丰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传播方式,主动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环境。

另有学者研究了对非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相关专题。李玉洁(2022)^②认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超越了西方媒体对非国际传播的“二元对立”“文明冲突”等狭隘的民族—国家价值取向,更新了中国对非国际传播的传统情感价值取向,呈现出中非共享的全新价值特质。以此为价值指引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一方面,应精选对非国际传播的核心话语,以“中国之治”为代表的政治话语,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代表的发展话语,以“以人民为中心”为代表的民生话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外交话语。另一方面,还应探究对非国际传播的策略创新。构建对非国际传播的多元主体格局,打造对非国际传播的融合媒介平台,实施基于非洲国别研究的精准传播方略,提升跨文化语境下对非国际传播的叙事艺术。

(二) 意识形态斗争与批判

大国竞争泛意识形态化、西方意识形态联盟对抗、意识形态妖魔化污名化、颜色革命和错误社会思潮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构成百年大变局下的主要意识形态风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为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带来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挑战。魏志奇(2022)^③认为,在这一大变局下,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就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提高意识形态领导力,这是根本保障;充分利用大变局带来的历史机遇,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这是根本准备;充分利用大变局的时与势,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这是根本要求;充分认清大变局下意识形态斗争的本质,坚决开展国际意识形态斗争,这是重要手段。王传剑和魏鑫(2022)^④认为,中国应在积极引导中美安全竞争朝向良性轨道发展的同时,继续推进与东盟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处理和管控好这组重要的三边关系。在对美国意识形态和霸权护持的研究方面, Magdoff 和 Sweezy (2022)^⑤认为,美国通过实施一场无限制的军备竞赛拖垮原苏联结束了冷战,但冷战似乎又并未结束,原因在于美国统治阶级的冷战思维惯性、霸权思维和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从未像今天这般容易发生不受控制的危机和灾难。于铁军(2022)^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进行系统性

^① 臧秀玲(202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内涵与提升路径”,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第122-131页。

^② 李玉洁(202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探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5期,第69-79页。

^③ 魏志奇(2022):“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7期,第130-139页。

^④ 王传剑、魏鑫(2022):“战略竞争下的中国—美国—东盟三边安全关系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第4期,第99-124页。

^⑤ Magdoff, H., & Sweezy, P.M. (2022). End of Cold War Illusions. *Monthly Review*, 74(6), 54-56.

^⑥ 于铁军(2022):“霸权的护持: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第5期,第9-38页。

分析后发现,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最重要的功能是护持其全球霸权,但大战略目标设置失当和对外政策过分意识形态化常把美国战略引入歧途。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政治功能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且对指导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申文杰,2022)^①。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结晶和指导思想。它系统回答了新时代要建设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怎样建设新时代意识形态的根本性问题(石云霞,2022^②)。在人民民主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实现了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回应和超越,有利于打破中国民主的国际话语权困境(赵春丽,2022^③)。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方面,王永贵(2022)^④认为,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新时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安全,事关国家安危和民族存亡。唐爱军(2022)^⑤则认为,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是当务之急,需要着力构建更加积极斗争的国际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基于人心的意识形态认同体系。

另有部分学者对西方金融理论和资本现象进行了批判。郗戈(2022)^⑥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历史唯物主义打开了历史特定性和开放性维度,是真正基于时代变迁和社会差异把握住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历史性辩证法。徐景一(2022)^⑦基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分析框架分析当代西方数字资本问题后发现,伴随数字资本积累过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显现出不同的矛盾形式。这些矛盾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累积,衍生出数字平台生产相对过剩与数字金融投机下的经济停滞危机、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下的社会对立危机。毕照卿(2022)^⑧则通过梳理金融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指出导致其内在缺陷的成因。其认为,希法亭和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分野源于二者依据的现实材料差异、对马克思理论逻辑和方法理解的差异以及对时代方位与历史形势的判断不同等。回顾列宁和希法亭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论争,不仅有助于在思想发展脉络中展现马克思剖析资本形态的科学方法与分析逻辑,而且可为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理解和考察资本无序扩张及其蕴含的金融化趋势,乃至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七、总结

^① 申文杰(2022):“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政治功能理论及其现实价值探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期,第86-94页。

^② 石云霞(2022):“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第61-74页。

^③ 赵春丽(2022):“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提升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5期,第35-45页。

^④ 王永贵(2022):“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6期,第114-124页。

^⑤ 唐爱军(2022):“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6期,第125-135页。

^⑥ 郗戈(2022):“走向‘特定性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深化”,载《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第27-45页。

^⑦ 徐景一(2022):“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视角下的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批判”,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第133-142页。

^⑧ 毕照卿(2022):“列宁对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的批判与发展及其当代价值”,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期,第105-116页。

回顾2022年的文献，相关研究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架构及相关学科体系建设，对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议题分布来看，相关研究主要涵盖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与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百年变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推进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均属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范畴。

从主要创新来看，一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学者从本体层面、经验层面、规范层面入手，努力把中国外交实践上升为理论认识和知识体系，使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或是建立另一种新的理论叙事。二是方法论的创新。部分文献引入理论模型和计量经济学，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分析当代国际现实问题。

从研究方法来看，部分文献交叉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关系学、国际经济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综合运用归纳演绎、计量模型、数据分析等对当代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等重大议题进行研究。

从主要结论来看，一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二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合作倡议，取得了斐然成绩。相关文献从政策红利溢出效应、劳动配置效率、资金融资效率、政策协同、国家形象、国家治理等方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并得出稳健可信的结论，这对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从根本上回答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向纵深发展、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世界应该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指引着中国和世界前进的正确方向，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四是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结晶和指导思想。它系统回答了新时代要建设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怎样建设新时代意识形态的根本性问题。

（执笔人：贾中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室）